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2015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

第九卷

高有鹏 著

线装书局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2015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

第九卷

高有鹏 著



线装书局

目 录

六、钟敬文	(2949)
(一) 早期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2949)
(二)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时期	(2956)
(三) 从杭州到日本	(2966)
(四) 归来	(2972)
七、茅盾	(2974)
(一) 关于民间文学基本形式与精神的论述	(2977)
(二) 神话研究及其神话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	(2996)
八、老舍	(3039)
(一) 关于民间文学在文学起源和发展中的价值与意义	(3041)
(二) 关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	(3045)
(三) 关于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问题	(3051)
九、朱自清	(3060)
(一) 为民众的立场	(3061)
(二) 歌谣与诗歌	(3070)
(三) 现代歌谣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3073)
十、闻一多	(3085)
(一) 民间歌谣研究	(3086)
(二) 民俗学视野中的文化研究	(3095)
(三) 神话传说研究	(3103)
十一、郑振铎	(3114)
(一) 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	(3115)
(二) 俗文学视野中的民间文学	(3120)
(三) 文学发展中的民间文学	(3129)
(四) 对域外民间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及其神话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 方法	(3136)
十二、赵景深	(3141)
(一) 童话理论	(3142)

(二) 民间文学的戏曲研究	(3148)
第二十五章 民族学为背景的民间文学理论建设	(3153)
一、民族志的意义	(3157)
二、边疆建设的文化选择与民间文学问题	(3167)
第二十六章 中国现代民间歌曲理论	(3172)
第二十七章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3187)

六、钟敬文

钟敬文（1903年3月30日—2002年1月10日），原名钟谭宗，字静闻、金粟，广东海丰人。1922年，他毕业于广东省海丰县陆安师范学校，在师范学校读书时，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曾经创作白话新诗；其毕业后曾经做小学教师，搜集整理民间歌谣和民间故事，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等报刊发表民间文学研究文章《读〈粤东笔记〉》《南洋的歌谣》《海丰人表现于歌谣中之婚姻观》等，与人一起出版诗歌《三朵花》。20世纪20年代中期，钟敬文到广州岭南大学国文系读书和工作，整理《粤风》等民俗文献，并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民间歌谣集《客音情歌集》和民间故事集《民间趣事》，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民间歌谣集《蛋歌》。1927年，钟敬文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参加创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和民俗学讲习班，编辑《民间文艺》与《民俗周刊》、民俗学丛书，出版《民间文艺丛话》等著述，经历了所谓的《吴歌乙集》“猥亵民歌”事件，之后辗转来到浙江杭州，与朋友发起中国民俗学会，主编《民众教育季刊》《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等刊物与民俗学丛书，发表《〈山海经〉神话研究的讨论及其他》（1930）、《中国民间故事型式》（1931）、《中国植物起源神话》（1933）、《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1933）等理论文章，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学研究事业。其散文《荔枝小品》《西湖漫话》《湖上散记》等以清秀绝俗为人称道。20世纪30年代初期，钟敬文求学日本，系统接受日本民俗学理论，写作和发表《老獭稚型传说之发生地》《盘瓠神话考察》和《民间文艺学建设》等文章。1936年回到中国后，他提出并阐述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主张，在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投入抗日洪流，组织文协，坚持报告文学写作等抗日宣传，发表了《抗日的民间老英雄》《指挥刀与诗笔》等文学作品。此后辗转广东、广西、香港等地，锲而不舍于民间文学研究，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织者和建设者。1949年之后，他以杰出的贡献受到拥戴，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学科与中国民俗学的一面旗帜。

钟敬文是在五四歌谣学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学者。他的民间文学研究在总体上分为歌谣研究、神话传说故事研究与民间文学的价值意义研究，包括以民间文学为主体的民俗学研究；特别是他所提出的民间文艺学概念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一）早期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钟敬文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事业，1949年之前，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思想理论形成与发展阶段；其中，1922年至1926年之间，其学术活动基本上属于五四歌谣学运动，可以视为其早期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与理论研究。

钟敬文搜集整理民间歌谣受到五四歌谣学运动的影响。关于他的一些传记称，早在其师范学校刚毕业做小学教师，其时还是一个20岁的青年时，就开始搜集整理家乡的民间歌谣，并向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投稿。后来，他也多次提

到这些活动。他在《客音情歌集》的“引言”中曾经提到这些活动，说：“我数年来，承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诸同人的奖励与诱掖，收集到了千首左右的歌谣，而这客音的山歌，便占据了它全数之半。两年前，曾草草录出数十首，编成一小册子，名曰《恋歌集》，寄交会中。不久同人要把它付印，我觉得那册东西，编辑时太过草率，不成什么样子，因写信回绝了他们。年来会中为了经济缺乏，出版丛书的计划，不能不暂时中辍；而我也就没有多兴趣去再把那些积稿清理——除了去年勉强整理出一百首肇（shē）歌以外——所以这回的工作，算作一种侥幸，并不是什么过言了。”^①

检索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可以看到自1924年5月《歌谣周刊》第54号刊载有“收到钟敬文广东海丰歌谣六则”开始，之后，从1924年11月《歌谣周刊》第67号，至1925年6月《歌谣周刊》第91号，其发表相关文章有十几篇。诸如《读〈粤东笔记〉》（《歌谣周刊》第67号，1924年11月9日）、《读〈粤东笔记〉》（续）（《歌谣周刊》第68号，11月16日）、《南洋的歌谣》（《歌谣周刊》第70号，1924年11月30日）、《山歌》（《歌谣周刊》第71号，1924年12月7日）、《潮州婚姻的俗诗》（《歌谣周刊》第72号，1924年12月14日）、《海丰人表现于歌谣中之婚姻观》（《歌谣周刊》第74号，1924年12月28日）、《猥亵的歌谣》（《歌谣周刊》第74号，1924年12月28日）、《故事之俚谚》（《歌谣周刊》第77号，1925年1月18日）、《从古诗窜改出来的歌谣》（《歌谣周刊》第77号，1925年1月18日）、《附会的歌谣》（《歌谣周刊》第78号，1925年2月15日）、《歌谣之一种表现法——双关语》（《歌谣周刊》第80号，1925年3月1日）、《海丰的邪歌》（《歌谣周刊》第81号，1925年3月8日）、《故事的歌谣》（《歌谣周刊》第85号，1925年4月5日）等。同时，他还在《语丝》《文学周报》等报刊发表许多歌谣研究的文章，如《歌王——读台静农君〈山歌原始的传说〉》（《语丝》第23期，1925年4月20日）、《说福佬话人民的孟姜女传说及其他》（《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5期，1925年11月11日）、《汕尾新港疍民调查》（《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22期，1926年8月4日）、《特重音调之客歌》（《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24期，1926年8月18日）、《〈肇歌集〉序》（《文学周报》第234期，1926年7月18日）、《读〈中国民歌研究〉》（《黎明》第3卷第45期，1926年9月19日）、《重编〈粤风〉引言》（《文学周报》第255期，1926年11月17日）等。他的勤奋与执着是非常可贵的。

此时，他在《歌谣周刊》发表了《广东海丰的孟姜女传说》（《歌谣周刊》第79号，1925年2月）、《情史及戏曲大全中之孟姜女》（《歌谣周刊》第83号，1925年3月）、《送寒衣的传说与俗歌》（《歌谣周刊》第90号，1925年5月）等，论述地方民间流传的孟姜女故事。他还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等报刊发表许多关于广东陆安地方传说故事的文章，诸如《单身娘子》（《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1期，1925年10月14日）、《月华》（《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2期，

^① 钟敬文：《客音情歌集》，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2月版，第1页。

1925年10月21日)、《鼠与牛和猫排生肖》(《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4期,1925年11月4日)(图9—1)、《老虎外婆》(《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10期,1925年12月16日)、《憨子婿上厅》(《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20期,1926年7月21日)、《猴的故事》(《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21期,1926年7月28日)等。这些歌谣与故事搜集整理及其理论研究,不仅仅体现出钟敬文对民间文学的巨大热情,而且体现出其许多富有真知灼见的思想文化品格。

他以诗人常有的敏感,迅速捕捉到民间文学中闪烁出的思想文化的火花,善于发现,善于观察和总结,形成他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学思想理论风格。这与历史学家出身的顾颉刚他们一切从材料出发的理论方法,皆有异曲同工之处。如其阅读《粤东笔记》中所发现传统文献中的“增削任情”,称:“书中保存着的许多歌谣,是否有经过他改窜和润饰的地方,从古许多保存下来的歌谣,十之八九是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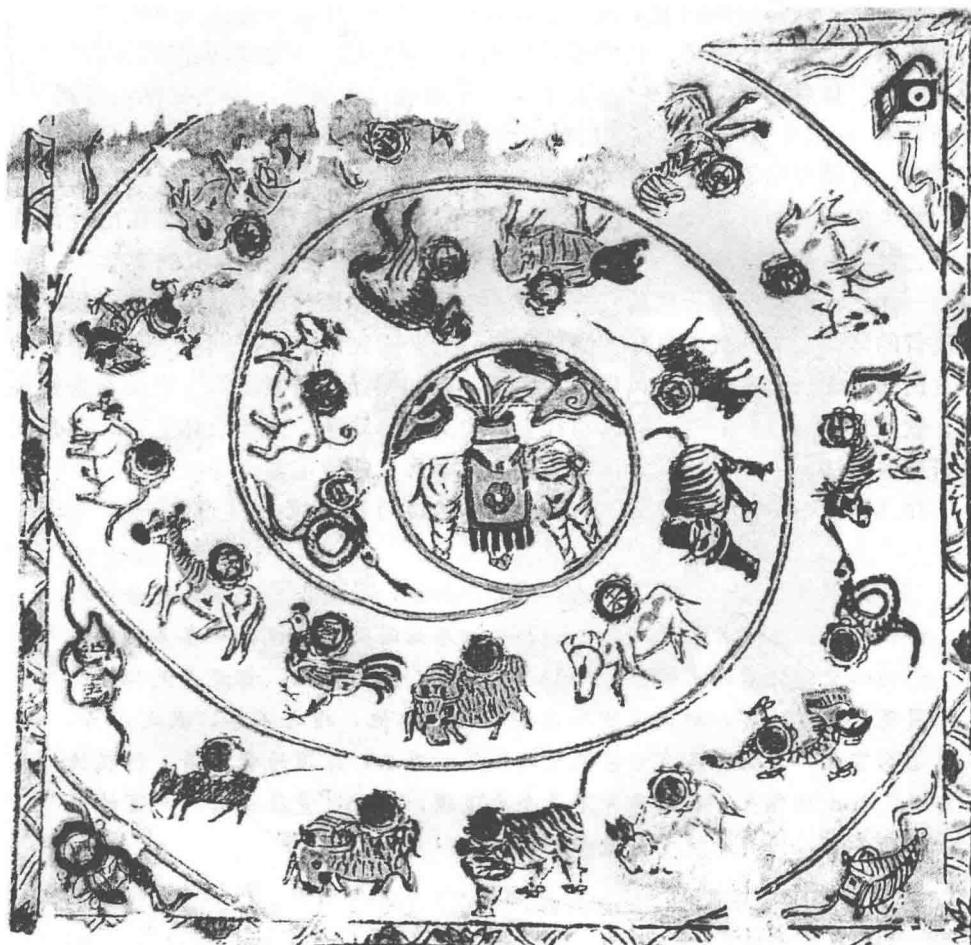


图9—1

经受了采集者的一番改削的。因为前人对于歌谣，多半是取其内涵的义理，而不注重其外表的词句——无论歌谣之附会或赏鉴者，都是如此；——所以增削任情，是我们中国人对于歌谣的传统方法。”^① 在民间歌谣用语的双关性中，他发现“在歌谣中的势力颇形普遍，最大的缘故，是歌谣为口‘唱的文学’，所以能适合于这种‘利用声音的关系’的表现。尤其是表现关于恋爱的文艺，这种婉转动人的方法，更切用而且多用”^② 云云。又如其对“咸水歌”艺术特色与“疍民”生活的发现，钟敬文将疍民视作“未开化的民族”，其论及他们中流行的“咸水歌”，曰“略同现在各地流行的山歌，多为七言四句体。每首一章的为普通，二章以上的，虽然也有，但不大多。最可注意的，是每句末端，皆附有助词，在我们这里一带通行的，是一个‘罗’字。诗歌中，这种尾声的附加，在吾国颇不乏例。如古歌谣中的‘兮’字，《楚辞》中的‘些’字，都是和这一类的东西”“多喜用显比、隐比和双关等表现法，而咸水歌则除常以别的事物‘起兴’外，其余都为极直率的陈述，回环吞吐的风格，绝少能得见到”“表现上过于直率”等内容，其总结民间文学的“一条通例”道：“凡民族生活简单的，他们歌唱的生活，总要发达得多。几乎可以如此说：他们的生活的极大的慰安与悦乐，便是唱歌。休息时，固然要唱，工作时，尤要唱，独居时，固然要唱，群居时，更加要唱。（图9—2）所以在他们居处中，无论是在烟雾犹迷的清晨，日中鸡唱的亭午，月明星稀的晚上，都可以闻到他们婉转嘹亮的歌声，有如歌者之国一样。獮人如此，苗民如此，便是我们一部分未尽开化的汉人，散居在山岭深处的，也何尝不然”，“惟其环境如此，所以能够产出一种极有价值的文学”^③。或曰，一切发现都来源于长期的观察与深入的思索，包括其深入社会底层对民间社会流行的口头文学形式的具体感受。在这一时期的民间歌谣研究中，他已经开始注重民间文学所表现的社会风俗生活内容，诸如歌谣与婚姻生活、歌谣与婚姻观念、歌谣与社会猥亵心理、歌谣与社会历史文化等问题。而在总体上讲，还是文学研究的方法，更注重民间歌谣作为民间文学形式的价值意义等内容。

在《歌王——读台静农君〈山歌原始的传说〉》中，他论述道：

用不着我来“剥削”的说，谁都会知道，我们中国现在大部分的社会，是尚处在半开化的状态中的，一切原始时期的传说，尚在多数的人们的心里居留着而未收它的幻影。不信吗？见了月蚀，都说是天狗在吃月亮；见了地震，都说是地牛在翻身呢。其他，指之不尽，数之不清，总而言之，万物都各有它极浪漫的传说的外衣，深深地蒙盖着。但在传说，虽出自原人，其所言并不是全无道理，有时，竟蕴藏着极丰富的义理在其中，固非徒饶于韵趣而已。

① 钟敬文：《读〈粤东笔记〉》，《歌谣周刊》第67号，1924年11月9日。

② 钟敬文：《歌谣之一种表现法——双关语》，《歌谣周刊》第80号，1925年3月1日。

③ 钟敬文：《中国疍民文学一脔（luán）》，《蛋歌》，（上海）开明书店，1926年12月版，第86—88页。

蚊止小



图 9—2

“话皮揭开，话肉讲来。”

台君所写出的两条关于山歌原始制作之传说，我觉得它不但是很富于趣味，而且也是极有意思的。我读了，颇联想到十二三岁时看过的东周列国志里的一段故事。隐约记得它是这样的，齐桓公起兵伐山戎，因及孤竹，在那里，山路崎岖，很难行走，管仲乃制上山下山两歌，使军士唱之，因各忘其困苦，遂定孤竹。这段事，和那两节传说，在表面上看来，虽全没有黏着，但我们细考它内含的道理，却很相像，——就是所谓“凡人劳其形者疲其神，悦其神者疲其形。”不过，在同一的树丛上，开放出几葩色香一样的花朵吧了。

关于山歌的传说我也得到一点资料，虽然是零缺而不完整的。

你晓唱——

你知歌王在哪往？（哪往，哪方也。）

你知歌王几时死？

死在哪山哪干葬？（哪干，哪场所也。）

我晓唱——（我字，客音读如“呆”。）

我知歌王在浙江；

八月十五歌王死；

死在南山路里葬。

我真懊恨，关于这位歌王的故事的传说，比较歌里所言更其详尽的，我此刻不能从人们的口里得到，虽然如此，但在许多人们的口舌中，确有一个极浪漫的传说，至少如歌里所咏的，这是毫无可疑的了。我约略记得在别人所采集的山歌里，也有和我这么差不多的两首歌词，那么，显见得这桩传说，是必然流传得很广远的了。我此除恨不能听到的话，在别人也许早听得烂熟了，若有人把它详细的描写了出来，使大家都认识了这位歌王的故事，不是很有味儿么？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于广东海丰^①

此一时期，钟敬文主要研究民间歌谣，涉及民间故事的文章并不是很多，但是却都很有见地。如其《陆安传说·缀言》，论述这些“民众口里所流传的”地方传说，其中“有的是荒唐的传说，有的是滑稽的趣事，有的是空幻的童话”，他说：

这许多故事中，我相信必有若干是各地所共同的。（也许有的已经别人先我写出。）不过，大体虽然相近，性质上至少要各带着几分不同的地方色彩。这种大同小异，或竟是小同大异的东西，在研究者的眼光

^① 钟敬文：《歌王——读台静农君〈山歌原始的传说〉》，《语丝》第23期，1925年4月20日。

看来，正是绝好的足资比较研究的材料。然即在赏鉴方面也非无益处。因它在同一的事情上，可以感到异样的情调与色素。

我的文章，十分生硬与芜杂，是用不着自讳的。像这样稚弱到很可以的东西，献给文艺的鉴赏家，我固万分不敢，便是贡于天真活泼的小儿童，恐也不能有用。我的微愿，只在给予喜欢研究这门功课的先生们一点参考的材料，其他更非所敢想的了。^①

再者是关于徐文长故事与呆女婿故事的讨论。当时，北新书局出版了《徐文长故事》和《呆女婿故事》，同时，赵景深等学者在报刊上对此类问题展开讨论。如赵景深发表《徐文长故事与西洋传说》等文章；钟敬文因为参与其中，他发表《致赵景深君论徐文长故事》与其提出不同意见。他指出“‘智慧’与‘愚騃



图 9—3

(*si*)’，是人性中的两方面”，（图 9—3）“在我们中国民间的传说里，代表智慧方面的人性的故事，便是徐文长；代表愚騃方面的人性的故事，便是呆女婿”，“你说他应该归入呆女婿一类的故事中，不知到底别有什么解说”，“我们试把它和繁女君所写的一条，详细的比看一下，益发可以见得那张五麻子的故事，是应该

^① 钟敬文：《陆安传说·缀言》，《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 1 期，1925 年 10 月 14 日。

属于徐文长一派的”^① 云云。此时为 1925 年，在五四歌谣学运动时期，出现了关于徐文长故事的讨论。至此，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出现一个可喜的开端。

（二）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时期

钟敬文来到中山大学，编辑《民间文艺周刊》《民俗周刊》和民俗学丛书，是他民间文学思想理论发展的又一个阶段。风华正茂的钟敬文尤其勤奋，他与顾颉刚、董作宾、江绍原他们心心相印，开诚布公，情同手足，一起孜孜以求，兢兢业业，辛勤耕耘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田地，表现出忘我的境界与高尚的品格。

日本人直江广治总结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民俗周刊》的成就时说：“综观此期间《民俗周刊》的成绩，概括起来共发表有 178 篇故事、112 篇传说、161 篇民谣、38 篇谜语、9 篇谚语、130 篇习俗报告、44 篇信仰报告和 196 篇研究论文等”，其中“以故事的报告资料较多”，“《歌谣周刊》还出版了关于神、谜语、歌谣、故事、传说、槟榔、蛋民、清明、中秋、新年、祝英台故事、王昭君（图 9—4）、山海经、妙峰山进香的特集号”，其称“（中山大学）民俗学会除了发行《民俗周刊》外，还出版了 36 册丛书，若与北大所出的《吴歌甲集》和《看见她》两册相比，实在可说是很大的收获”^② 云云。其中，他特别举例钟敬文与人合编的《狼僮情歌》，他和杨成志合著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以及他的《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等；其称《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这项翻译造成了一种刺激”，“使学者们趋向于注意各国故事的一致性，并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③。直江广治还说，“歌谣研究发展到后来，不仅是研究汉族的歌谣，也扩展到搜集住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歌谣”，“自钟敬文的《蛋歌》《客音情歌集》开始，瑶歌、蛋歌、僮歌、狼歌等歌谣集也相继问世”，其举例称“在最初采集的歌谣中，只是将采集来的歌谣杂乱的并列在一起而已，慢慢地，在排列歌谣时开始注意分类。接着，研究性的概论书籍也出现了”，其中就包括钟敬文的《歌谣论集》^④。

直江广治总结“民间传说研究的成果”时尤其强调道：

随着故事资料的累积，研究故事的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分类的重要性。杨成志、钟敬文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便是依据美国班尼女士著的《民俗学手册》一书的附录翻译而成。钟敬文还更进一步，写了一本《中国民间传说型式表》，虽然内容简单，却是第一次将中国故事予以分类的型式表。这本书以《中国民间传说的型式》为名，被介绍到

① 钟敬文：《致赵景深君论徐文长故事》，《京报副刊》第 328 期，1925 年 11 月 14 日。

② [日本] 直江广治：《中国民俗文化》，王建朗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83 页。

③ [日本] 直江广治：《中国民俗文化》，王建朗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84 页。

④ [日本] 直江广治：《中国民俗文化》，王建朗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94 页。



图 9—4

日本（见《日本民俗学》5卷11期）。钟敬文还有一本《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的著作，乃是就普遍流传于世界上的 swan maider（白天鹅处女）故事中的中国故事部分，加以研究而成，是一部难得的佳作^①。

搜索此一时期（1927年至1928年）钟敬文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著述，笔者不完全统计，大致可数：

《谈两部民歌集——〈吴歌甲集〉与〈白雪遗音选〉》（《一般》第2卷第4期，1927，4，5）

^① [日本]直江广治：《中国民俗文化》，王建朗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198页。

- 《关于民间趣事》(《北新》(第1卷第35期, 1927, 4, 23))
《山歌选序》(《北新周刊》1927年第1卷第51、52期)
《重编〈粤风〉引言》(《文学周报》1927年8月第4卷)
《民间文学》(《民间文艺》1927年第3期, 1927, 11)
《我所闻的灶神故事》(《民间文艺》第9、10期, 1927, 11, 8)
《中国古代几个鸟的传说》(《民间文艺》第2期, 1927, 11, 8)
《歌仙刘三妹故事》(《民间文艺》第5期, 1927, 11, 29)
《马头娘传说辨》(《民间文艺》第6期, 1927, 12, 6)
《歌谣论集》序(《民间文艺》第7期, 1927, 12, 13)
《台湾民间的趣话》(《民间文艺》第9、10期, 1927, 12, 20)
《客音的山歌》(《语丝》1927年第118期)
《两首畜言诗的取材》(《民间文艺》第11、12期, 1928, 1, 3)
《粤风》(李调元编《粤风》整理本), 北京朴社1927年版。
《中国民间文学——脔——咸之歌》, 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版。
《客音情歌集》, 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版。
《歌谣论集》, 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版。
《游山》(《北新》第1卷第32期, 1927, 4, 2)
《谈谈兴诗》(《文学周报》第281期, 1927, 9, 25)
《关于〈诗经〉中章段复叠之诗篇的一点意见》(《文学周报》第285期, 1927, 10, 9)
《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文学周报》第6卷, 1928, 7)
《宋代民歌一斑》(《文学周报》第297期, 1928, 2)
《谈谈兴诗——致顾颉刚先生的信》(《文学周报》第5卷第8号, 1928, 2)
《花束》(《文学周报》第339期, 1928, 10)
《广州风物杂忆》(《一般》第3卷第2号, 1927, 10, 5)
《从迷恋的梦里归来》(《一般》第3卷第4号, 1927, 12, 5)
《旧梦》(《一般》第4卷第1号, 1928, 1, 5)
《读燕筑信》(《一般》第4卷第1号, 1928, 1, 5)
《介绍一部六十多年前的风俗书》(《民俗周刊》1928, 1)
《闽南故事集》(《民俗周刊》第2期, 1928, 3)
《台湾的民歌——谢云声君编的〈台湾情歌集〉序》(《民俗周刊》第3期, 1928, 4)
《呆女婿故事探讨》(《民俗周刊》第7期, 1928, 5)
《读〈三公主〉》(《民俗周刊》第6期, 1928, 5)
《艺术三家言》(《民俗周刊》第8期, 1928, 5)
《支那童话集》(《民俗周刊》第13、14期, 1928, 6)
《关于〈孩子们的歌声〉——序黄诏年编的儿歌集》(《民俗周刊》第17—18期, 1928, 7)

- 《关于刘三妹故事的材料（六则）》（《民俗周刊》第19—20期，1928，8）
《台湾俗歌》（《民俗周刊》1928年第10期）
《波斯故事略窥》（《民俗周刊》1928年第21、22合刊）
《答茅盾先生关于〈楚辞〉神话的讨论》（《民俗周刊》1929年第86—89期）
《歌谣杂谈之二：同一起句的歌谣》，《民间文艺丛书》，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丛书1928年6月版。
《楚辞中的神话与传说》（《大江周刊》1928年11、12月号）
《七夕风俗考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新周刊》1928年第1卷第35、36期合刊）
《瑶民略考》（《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新周刊》1928年第1卷第35、36期合刊）
《民间文艺丛话》，中大民俗学会丛书，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版。
《马来情歌》，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8年12月版。
《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与杨成志合译），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版。
《中秋夜的西湖和我》（《山雨》第1卷第6期，1928，11，1）（图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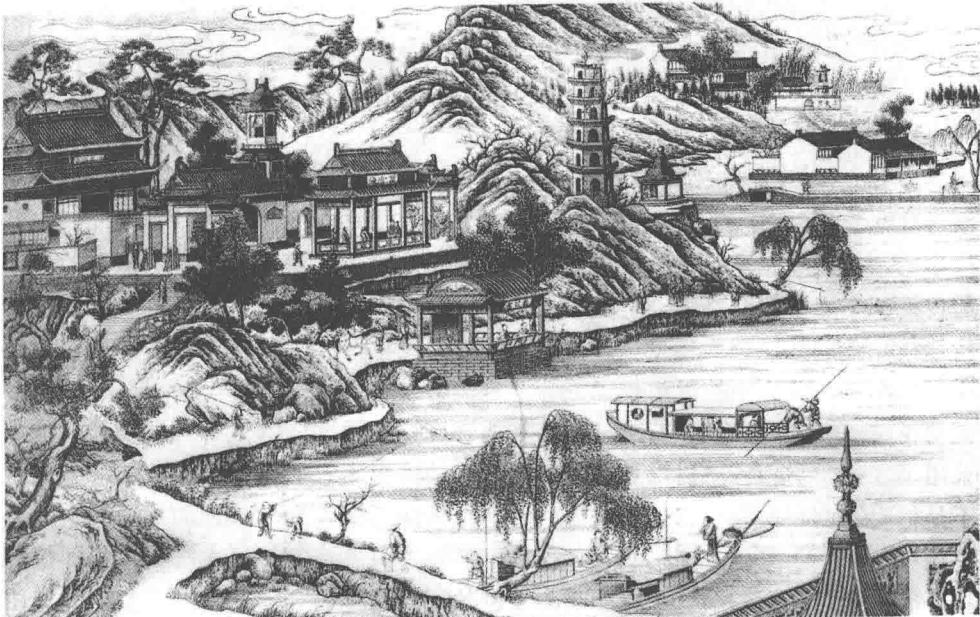


图9—5

- 《想起五坡岭的母校》（《山雨》第1卷第7期，1928，11，16）
《马来情歌》，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8年12月版。

这一时期，他的民间文学思想转向民间故事的趋向越来越明显。从这里可以看到，除了继续研究民间歌谣与社会风俗。其有意识将神话研究、传说研究、故事研究与民间信仰和历史文化的研究相结合，形成综合性的社会文化研究。其民间歌谣的研究也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如其在《马来民歌研究》中所说“我之意识地爱好民歌，是最近数年来的事”，“但以前，在翻阅古诗歌的集子时，对于两汉及南北朝时期那些乐府风谣，早已感到特殊的兴味。那种纯朴的风格，真切的情感，实在足以深深敲动我天真少造作的心绪，而以为她比起那些文人们辛苦经营的创制更为可爱赏”，而“近几年来，歌谣运动突兴，尤教我从理论上实际上认识了野人之诗风谣整体的价值”，他接着说，“从北京大学于民国七年起，开始搜集歌谣，到现在十年中间，中国境内野生的诗作之被发掘者，最少在三万首以上”，“然在现代，对于一种学术的研究，其取材之范围，须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聚古今中外于一处，然后条分而缕析之，综合而归纳之，始能发见真相，而有奇大的创获”，“若仅限一地一时，则所得未免过于偏浅，或有陷于谬误的危险”，“这单就站于歌谣的研究上着想，觉得已很有翻译国外民歌、介绍到中国来的必要”，“若另换一面，从欣赏文学艺术的立点看，介绍些域外的民族的诗作进来，以供大家的鉴赏，尤其是很需要的”，“何况民谣还是供给民俗、历史、教育各方面之研究呢”^① 云云。确实，其学术视野不断扩大之多民族、多地区，既有古代历史文献的钩沉，又有当世民间传说的搜集，也有外国民间故事的引入。其注重“整体的价值”的学理思辨性也越来越增强。从研究内容上看，虽然民间歌谣的研究仍然是其重要研究对象，但是，民间故事的研究已经成为他学术研究的重要一翼。诸如《我所闻的灶神故事》、（图 9—6）《中国古代几个鸟的传说》《歌仙刘三妹故事》《关于刘三妹故事的材料（六则）》《马头娘传说辨》《台湾民间的趣话》《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闽南故事集》《呆女婿故事试说》《波斯故事略窥》《楚辞中的神话与传说》等，以及《瑶民略考》《七夕风俗考略》，其故事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宽，研究方法也越来越注重多元并用。其《楚辞中的神话与传说》指出，研究神话，不能仅仅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要注意到神话学的特殊性，以此他强调要联系《山海经》《列子》和《淮南子》等文献中的神话传说，他把《楚辞》中的神话传说分为“自然力及自然现象的神”“神异境地”“异常动植物”“神仙鬼怪”“英雄传说用其他奇迹”等类型，针对每一类神话，他都采用了人类学的理论，借以理解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遗留物内容。这种方式并不是他的首创，但是，却体现出这一时期神话研究中人类学理论的重要倾向。其中还有他关于刘三妹（刘三姐）传说研究，对古代典籍文献记述与现世民间流传材料的对比与分析总结，深刻影响到后世的同类题材研究。其一方面注意到民俗诸如灶神信仰，其作为历史文化传统所体现的风俗生活内容，从中分析传说故事的具体变化原因，另一方面，他注意到台湾故事、闽南故事的特殊价值，而且其有意识进行不同民族或不同国家的民间文学在文化比较中的研究。这些研究方法

^① 钟敬文：《马来民歌研究》，《马来情歌》，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8 年 12 月版。



图 9—6